

# 试论北京辅仁大学的创建

孙邦华

本文对北京辅仁大学十分漫长、艰难的创建过程进行了详细的考察，指出了英敛之、马相伯、雷鸣远、奥图尔、陈垣等人所起的作用，特别强调英敛之既是最重要的发起人，也是奠基人——为辅仁厘定了既要吸收西方最新科学、又能发扬中华固有的优秀文化的办学宗旨和信教自由的办学理念，并具有教育救国的思想特点，闪耀着爱国、爱教的可贵精神。

关键词：辅仁大学 马相伯 英敛之 陈垣 天主教

作者孙邦华，1964年生，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

北京辅仁大学作为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一所天主教大学，主要是在国籍天主教领袖英敛之、马相伯等人的大力呼吁、发起下创建的，其创办过程十分漫长、艰难，筚路蓝缕，颇费周折。

## 一、新教高等教育的先行与天主教高等教育的滞后

无论是新教学校，还是天主教学校，它们在中国都经历了从初等教育，到中等教育，再到高等教育这样一个历史发展轨迹。在19世纪下半叶，则主要以初等和中等教育为主。据统计，1875年，全国教会学校总数约800所，属于小学性质的约为93%；到1900年时，教会学校总数达到2000所，学生40000人，其中90%是小学程度。<sup>1</sup>但是，在19世纪末，新教传教士已经把高等教育作为发展在华教会教育的重点。1882年，至少有一所新教教会学校已具有高等教育性质，1894年，发展到4所，20世纪初，已增加到10余所。而天主教各修会的传教士仍旧把初等教育作为办学重点，到20世纪初叶，在华天主教学校总数远远超过新教学校。如1914年，天主教学校共有8034所，学生总数达132850名，新教学校共有4100所，学生总数约113000名。<sup>2</sup>两者在学生总数上相差不大，而新教学校只及天主教学校的一半。但是，此时的天主教大学仅有上海震旦学院一所，而且还是由中国天主教耆宿马相伯于1903年发起创办的。

19世纪60年代以降，中国开始兴起学习西方的早期现代化运动——洋务运动，面对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的变革，以美国传教士狄考文(Calvin W. Mateer)为代表的新教传

<sup>1</sup> 高时良主编：《中国教会学校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58页。

<sup>2</sup> 张力、刘鉴唐：《中国教案史》，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685页。

教士迅速做出反应。在 1877 年新教传教士在华第一次全国大会上,狄考文认为这将为他们“培养能以基督教真理来领导这场伟大的精神和物质变革人材”提供良机,呼吁传教士重视基督教教育,并且把教育的对象转移到中国的“上层人物”。<sup>①</sup>他在 1890 年在华新教传教士第二次全国大会上尤其强调了在中国发展基督教高等教育的重要性,认为“不论哪个社会,凡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都是有影响的人。他们会控制社会的情感和意见。对传教士来说,全面地教育一个人,使他能在一生中发挥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的巨大影响,这样做,可以胜过培养半打以上受过一般教育但不能获得社会地位的人。一个受过教育的人是一支点燃的蜡烛,未受过教育的人将跟着他的光走,比起绝大多数其它异教国家来,中国的情况更是如此。”他提出用基督教和科学教育培养“在中国任何一个阶层都将成为有影响的人”,“使他们能够胜过中国的旧式士大夫”。<sup>②</sup>另一名美国传教士李承恩(Nathan James Plumb)也在这次大会上指出“高等教育——这个主题是众所瞩目的——在不久的将来它很可能是教会工作的主要部分。”<sup>③</sup>尽管在新教传教士内部,对此问题存在着很大分歧,但是,最终狄考文等人的观点还是占据了上风。特别是来华的美国各新教差会,到 20 世纪初年更是把高等教育作为发展教会教育的重点。<sup>④</sup>

耐人寻味的是,晚清来华的自由派新教传教士重视发展中国基督教高等教育,正是对明末清初来华的天主教耶稣会士利玛窦(Matteo Ricci)等人开创的向中国上层官员和知识分子传教的策略的直接继承和发展,倒是晚清来华的天主教传教士们抛弃了这样的传教策略。把持中国天主教会的法国天主教修会没有像新教士那样意识到在华创办高等教育以培养高级知识分子的重要性,而长期奉行向中国社会下层或贫穷无识之民传教的政策,因而把初等学校和教理学校作为他们的办学方向,“天主教会有学校,这一点无可怀疑,但是他所应有的首先不是学者,而是宗教信徒。”<sup>⑤</sup>其结果,天主教在中国发展的教徒尽管远远超过新教信徒,但是,所造就的却是大量“吃教者”和不法教民。面对这种情况,中国天主教士英敛之、马相伯曾于 1912 年痛陈道:“即以北方而论,我圣教不独无大学也,无中学也,并正式高小而无之。只有法文学校,学成之后,只可依外人谋生而已。”<sup>⑥</sup>当中国政府开始创办高等教育时,天主教传教士也持敬而远之的态度,不愿意参与其事。1898 年,清政府创办京师大学堂时,曾委托天主教会莫里主教(Bishop Mouly)主持,“竟辞不受”。<sup>⑦</sup>清廷旋改聘新教传教士丁韪良(W.A.P.Martin)任总教习。

<sup>①</sup> 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下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10-11页。

<sup>②</sup> 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下册,第15页。

<sup>③</sup> 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下册,第43页。

<sup>④</sup> 新教在近代中国所办的13所大学,只有3所由英国和美国的新教差会合办,其余大学都是由美国各新教差会合办。

<sup>⑤</sup> 唐纳德·帕拉贡撰,辛岩译:《英敛之和北京天主教辅仁大学的兴起》,第171页。

<sup>⑥</sup> 马相伯、英敛之:《上罗马教皇请兴学书》,《辅仁生活》,第2期,1939年12月25日。

<sup>⑦</sup> 马相伯、英敛之:《上罗马教皇请兴学书》,《辅仁生活》,第2期。

## 二、《劝学罪言》与《夫至大》通谕

20 世纪初，中国天主教界有“南马（相伯）北英（敛之）”之说。为了兴西学、启民智，天主教南北两位领袖珠联璧合，携手共同发起筹办中国天主教大学——辅仁大学。

1912 年 9 月 20 日，英敛之、马相伯二人越过由法国人控制的中国天主教会，联袂直接上书罗马教皇碧岳十世（Saint Pius X）。在上书中，二人有感于来自美、英、德等国的新教传教士在中国办起了一所又一所大学，提倡学问；中国政府自办的京师大学堂、北洋大学堂也陆续开办起来，而“独我罗马圣教，尚付阙如，岂不痛哉！”他们特别推崇明末耶稣会士利玛窦等人重视文教的传教政策，批评当时天主教士把传教重心放在下层民众的策略：“无怪明末清初，人才辈出。今也何如！教中所养成者，椎鲁而已，苦力而已。求能略知时务，援笔作数行通顺语者，几寥落如晨星。”他们吁请教廷派遣教中博学硕德、明达热切之士来华，在北京创办一所大学，“广收教内外学生，以树通国中之模范，庶使教中可因学问，辅持社会，教外可因学问，迎受真光”。他们指出，适此民国肇兴、政体改造之机，新政府实行信教自由，新的文化教育方兴未艾，在华创办大学，“时机方熟”。<sup>①</sup>上书千余言，语重心长，情文俱佳，罗马教廷“颇为耸动，爰邀硕彦，缜密设计”。<sup>②</sup>不料，两年后，“一战”爆发，兴学之事于是停顿下来。

英、马何以要越过天主教会而直接上书教皇？因为他们深知法国保教权及其控制之下的中国天主教会实施的愚民政策，是兴办中国天主教高等教育事业的首要也是最大的障碍。

自 19 世纪中叶以来，中国天主教会并不是由世界天主教的总枢——罗马教廷直接管理，而是授予法国教会保教权，由其代管。<sup>③</sup>在法国的保教权之下，近代传教运动总是与西方列强的侵略扩张密切联系在一起，天主教传教士与法国驻华公使相互勾结与利用，从而使中国天主教会带上了浓厚的殖民主义色彩。如法国遣使会主教孟振生（Joseph Martial Mouly）曾在 19 世纪 50 年代说道：“对这个国家（中国），我们也有经验，在宗教事务上无须用大炮，也不用流血，只要法国命令自己的代理人用法国名义以坚决强硬的词句说话，什么事都可能解决。”<sup>④</sup>事实上他们也正是这样做。每当发生教务纠纷甚至是教案时——保教权及其保教权之下传教士的为所欲为正是教案频繁发生的最

<sup>①</sup> 《上罗马教皇请兴学书》，《辅仁生活》，第二期，1939 年 12 月 25 日。

<sup>②</sup> 纳爵：《辅仁大事记》，《辅仁生活》，第二期。

<sup>③</sup> 法国保教权源于 16 世纪法国对土耳其所订条约，应法国的要求，罗马教廷允许近东等地教会和土耳其政府如发生问题，由法国政府代表教会向土耳其政府交涉。法国在中国的保教权是仿照法国在土耳其的保教权而设的。顾卫民：《中国与罗马教廷关系史略》，东方出版社，2000 年，第 96-97 页。

<sup>④</sup> 卫青心著、黄庆华译：《罗马教廷与中国》（非公开出版），第 18 页，顾卫民：《中国与罗马教廷关系史略》，第 99 页。

重要原因——传教士总是请他们的驻华公使出面，而公使则以恫吓或武力威胁，迫使清政府及其地方官员就范，满足他们种种不合理或侵略要求。就连英国驻华领事阿礼国(Rutherford Alcock)早在1857年就批评法国的保教权及其传教士的非法行为：“基督教会在中国最大的敌人就是传教士自己和自称为保教者的西方强国。”<sup>11</sup>

在法国享有保教特权的情况下，中国的天主教会便与罗马教廷没有直接关系。尽管罗马教廷一直在努力从法国手里收回对中国教务的管理，并派遣使节或宗座代表，晚清时期的洋务大员李鸿章也试图通过与教廷通使来否定法国的保教权，由于受到法国政府及其在华法国天主教士的重重阻挠，而归于失败。但是，罗马教廷并没有放弃废除法国在华保教权的努力。<sup>12</sup>

尽管1912年上书兴学之事未果，但是英敛之和马相伯并未轻言放弃，他们曾分别再次上书罗马教宗，痛陈法国天主教士控制的各天主教修会实施的愚民传教策略的危害。

1917年6月，英敛之撰写了《劝学罪言》，开宗明义地指陈天主教士的蒙昧主义思想：“其多数反对读书者之辞曰：吾主耶稣所选宗徒，皆为愚鲁之夫，曷尝注重文学，此后历代大圣或苦修或显修，皆以热心事主救人为事，亦未见无学问不能升天国也。”近代来华西人大多具有强烈的欧洲中心论和殖民主义心态，他们中的一些人认为中国必将亡国，中文必将被西文所代替，因此反对将西学书籍译成中文，并以为“读中国书无用”，“问其何以无用，则曰不能挣饭吃，倘读外国书者数年，或于洋行、铁路、邮局，充一走卒，作一通事，则可月得数十番也。”英敛之指出，若照此下去，要在中国天主教会“内之求一司铎能作数行平常通顺之信者，几如晨星矣。”中国天主教士无疑将永远是“愚鲁贫贱”之人，而“自绝于高尚社会，自屏尔优秀人群”，<sup>13</sup>

英敛之进而一针见血地痛斥外国教会的愚民政策具有要把中国教民变成他们的“附属之民”的险恶目的，表现了强烈的爱国热情。他说：“然吾所目见耳闻者，则法教士惟歌功颂德于法，意、德等教士惟歌功颂德于意、德，甚至著书立说，惟恐人之不己从。必欲我国教民作为彼国征服附属之民，无不忠敬爱戴，而后始快于心。更闻有荒谬者流斥我国教民不爱彼国者，……今乃以少数偏私不化之流，演出形迹，使其人竟如虎伥，使其教竟同罪藪。”相反，“前岁比国被德残毁后，该国枢机主教某公发出勉励国民书一篇，反复譬喻，谆谆以爱祖国为训，至理名言，无论有识无识，莫不感痛。至于我国宣道者从未闻有提及爱国者（或有之，吾未闻也）。岂圣教道理，独于中国教民，当使之爱外国乎！真欲索解人而不得矣。”“呜呼！以独一无二纯正美善之圣教会，竟被诸

<sup>11</sup> 史式微：《江南传教史》，下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200页。

<sup>12</sup> 顾卫民：《中国与罗马教廷关系史略》，第97-127页。

<sup>13</sup> 英华：《劝学罪言》，1929年重印本（无出版社）。

<sup>14</sup> 在洋务派创办的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翻译西书上百部的来华英人傅兰雅(John Fryer)就曾对此进行过批判，孙邦华：《论傅兰雅在江南制造局翻译馆译书及其影响》，《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香港中文大学），1993年新第2期。

<sup>15</sup> 英华：《劝学罪言》，1929年重印本。

君作成一荆棘险仄之途，演成一偏私党派之窟，使我国中之人憎恶痛恨，裹足不前，呜呼！真道之不能广扬，是谁之过？”<sup>①</sup>把外国教会势力的殖民主义面目刻画得淋漓尽致。激扬文字，言人之未言，言人之不敢言。马相伯读后也深为英先生的勇气所折服，“读所赐《罪言》，尤不胜快慰！快人快语，实快我心！”<sup>②</sup>不久，马相伯也拟定“上教宗书”，继续批评外国教会的愚民政策：“又不准他会或他国修士设立高等学堂，及关于科学等种种建议”，“西国教士十无一二可说普通语言，华教士十无一二可写普通文字，至令教与教外，判然两国，格不相通”，致使传教的社会效果微乎其微。<sup>③</sup>

英敛之在斥责了外国教会的愚民之术，大声疾呼“以文学为第一要务”，“淳淳以读书尚学为劝”，“延聘素负声誉高明特达之教习，严定课程”。<sup>④</sup>全文凡 4000 余言，款款赤诚，跃然纸上。此书经人翻译成拉丁文后，上达罗马教宗，<sup>⑤</sup>“教宗深为嘉许”。

当英、马等中国天主教人士对天主教会的政策提出强烈批判时，来华的绝大部分天主教传教士自然是不以为然，但是，毕竟还是有个别西教士也对天主教会的所作所为提出批评，并进行反思。比利时籍天主教士雷鸣远(Fredric Vicent Lebbe)就是典型代表。当他于 1901 年 3 月到达天津时，看到的是刚刚经过八国联军征服后的惨状，他对西方殖民者的斑斑劣迹很不满：“我们军队所过之地，血流成河、劣迹昭彰，所作所为，迫使外教人发出恐怖的惨叫。”一年后，他又提出教会与殖民主义者纠缠在一起，造成了“在传教士与教友间有一道鸿沟”。<sup>⑥</sup>

雷鸣远与英敛之相识之后，由于有很多共识，很快成为莫逆之交。英敛之倡议在中国创办天主教大学的努力最终赢得教宗的支持，其中也与雷鸣远不无关系。1917 年 9 月，雷鸣远在给主教的一封信中提出了值得注意的三点看法：一是支持中国教友的爱国行动；二是提升中国籍神职人员为主教；三是废除法国保教权，并主张中国与教廷直接通使。<sup>⑦</sup>1920 年 12 月，当雷鸣远回到欧洲之后，连续被罗马教廷传信部长、国务卿、教宗约见，随即，罗马教廷决定向中国派遣宗座代表、祝圣中国籍主教等事。

1919 年 11 月，罗马教廷向全世界教会发布了一个普世通牒《教宗本笃十五世通牒》，通称“夫至大”通谕(Maximum illud)。值得关注的主要有三点。首先，要求在异邦传道的天主教士屏除邦族排外之心，屏除修道团体门户之见；其次，提升、陶育本地司铎；再次，陶育本地司铎的方法就是教育，但不能仅仅课以初浅的知识，“必当以充足圆满科目详尽之教课，一如文明国例当施于司铎者然。”<sup>⑧</sup>很显然，通谕对于学术颇为

<sup>①</sup> 英华：《劝学罪言》，1929 年重印本。

<sup>②</sup> 马相伯：《致英敛之先生书》，方豪编：《马相伯（良）先生文集·续编·新编》，第 170 页。

<sup>③</sup> 马相伯：《代拟北京教友上教宗书》，方豪编：《马相伯（良）先生文集·续编·新编》，第 63-64 页。

<sup>④</sup> 英华：《劝学罪言》，1929 年重印本。

<sup>⑤</sup> 英华：《劝学罪言·复友人驳劝学罪言书》，1929 年重印本。

<sup>⑥</sup> 英华：《劝学罪言跋》，《劝学罪言》，1929 年重印本。

<sup>⑦</sup> 雷鸣远：《雷鸣远神父书信集》，转引自顾卫民：《中国与罗马教廷关系史略》，第 137 页。

<sup>⑧</sup> 顾卫民：《中国与罗马教廷关系史略》，第 140 页。

<sup>⑨</sup> 马相伯译：《教宗本笃十五世通牒》，方豪编：《马相伯（良）先生文集·续编·新编》，第 225-241

注重,明确支持或提倡在传教地创办如同西方各国的天主教大学。

作为“普世通牒”,它所表达的思想,尽管不是专门针对中国的天主教情况,但与多年来英、马、雷等人的思想甚为契合,可以说切中了中国天主教会多年来的积弊。通谕的发表,也就意味着重新燃起了英、马在中国办天主教大学的希望。

1919年春,罗马教廷特派教务巡回使光若翰总主教(Jean B. M. de Guébriant),巡回中国各地天主教状况。结果,在所印发数十条问卷中,从各地司铎及教友反馈回来的意见,大多认为中国天主教高等教育尚属缺乏,乃目前急待开展的工作。光总主教返回罗马后所呈送的报告,多与英敛之上书中的建议相同,于是,教廷开始确悉中国创设大学为刻不容缓的事情。<sup>①</sup>

#### 四、从辅仁社到辅仁大学

辅仁社是英敛之在1912年9月上书教皇兴学暂时受挫后,于翌年秋季,在北京香山静宜园创办的学校。它以传授中国文化知识和中国天主教史为内容,以培养天主教青年为目标。英氏亲自授课,学制二年,学生来去自由,随来随学。<sup>②</sup>前后办了4年<sup>③</sup>,四方来游的公教学生甚多,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不能籍此改变天主教在中国的教育层次低下的现状。英敛之对此甚感忧虑,兴办天主教大学的信念变得更加强烈。1917年6月,他撰写《劝学罪言》一文,再次上书罗马教皇,要求在华兴学,终于引起教廷的积极回应,于是便有了奥图尔的来华。

1920年8月,天主教本笃第三会会士、美国俄亥俄州西顿大学教授奥图尔博士(Rev. George Barry O' Toole)受教廷委派来华调查教育。他旋即晤商英敛之,“二人所谈对于公教兴学一事,极相契合”,英氏并赠予《上教皇兴学书》和《劝学罪言》的西文译本。随后,奥图尔径直赴罗马将此事面陈教皇和传信部长,并请求天主教本笃会(Benedictines)总会长斐德理士(Rt. Rev. Fidelis)设法完成此举。<sup>④</sup>有奥图尔奔走呼号于上,在华兴学一事希望倍增。

1921年12月17日,教廷传信部正式向斐德理士转达教皇关于在华兴办大学的谕令,并且因筹集经费较为容易的缘故,将此事全权委托美国本笃会承办。1922年6月,教皇碧岳十一世(Pius XI)以恳切之词鼓舞全美本笃会会众加快在华兴学步伐。8月,罗马教廷任命刚恒毅主教(Archbishop Celso Costantini)为宗座首任驻华代表,11

页。

<sup>①</sup>《校史述略》,《辅仁大学1937年刊》;纳爵:《辅仁大事记(续)》中把光总主教巡回的时间说成是1920年春,《辅仁生活》,第三期,1940年1月25日。

<sup>②</sup>纳爵:《辅仁大事记(续)》,《辅仁生活》,第三期,1940年1月25日。

<sup>③</sup>1917年夏,河北一带发生严重水灾,很多人流离失所。英敛之应熊希龄之邀在香山主持慈幼局,以救济受灾儿童。由于救济事务繁重,无法兼顾辅仁社的讲学工作,是年冬,只得暂时停办辅仁社。纳爵:《辅仁大事记(续)》,《辅仁生活》,第三期。

<sup>④</sup>《校史述略》,《辅仁大学1937年刊》。

月，刚恒毅抵达北京。刚恒毅主教的来华，意味着法国在华保教权被否定，创立中国天主教大学的最大、最后障碍终被扫除。1923年2月24日，教皇又率先捐助10万里拉，以示倡导，并慨允今后向这所未来的大学寄赠一份教廷所有出版的著作。

1923年8月7日，全美本笃会召开专门大会，决定正式接受教皇关于在中国北京创办大学的委托，并托付宾夕法尼亚州圣文森会院（Saint Vincent Archabbey）司泰来（Aurelius Stehle）院长具体负责建校工作，其它各会院则给予人才和资金上的辅助。1924年6月23日，司泰来被教廷委任为未来大学的第一任监督，全权处理办学中的一切事宜。<sup>②</sup>至此，中国天主教大学开始进入实质性的筹办阶段。

1925年1月，司泰来任命美方发起人奥图尔司铎为大学校长，具体负责筹备工作。2月24日，他们二人同抵北京，<sup>③</sup>随即与中方发起人英敛之多次面晤，共同商议筹办大学的各项事宜，双方在办学指导思想上达成了共识。3月中旬，英敛之与奥图尔联合发表《美国圣本笃会创设北京公教大学宣言》，申明美国本笃会来华办学的目的“绝非用殖民政策，造成附属之品，乃为吸收中国有志爱群之士，本此志愿，同功合作。”并阐明未来大学的办学宗旨为“介绍西欧新得科学文化之精者，并保存中国旧有文学美术之最善者，舍短取长，不使偏胜。”<sup>④</sup>宣言的发表为本笃会与中国天主教士奠定了合作办学的基础。

1925年3月26日，奥图尔以16万元的价格，永久租下位于城北李广桥西街十号的旧涛贝勒府为大学校址。<sup>⑤</sup>再经修葺、布置，同时着手聘请教师，购置书籍、教学仪器、桌椅、体育器材等，至8月，筹备工作基本就绪。

在大学正式招生前，英敛之等人决定在王府西书房先办两年期的预备科。在预备科的取名上，马相伯与英敛之有不同的意见。马先生主张预科采用“景教”或“本笃”为校名，<sup>⑥</sup>但英先生认为该科“专事国学之研究，故取《论语》‘会友辅仁’之义，名辅仁社”，既显得典雅，又能反映中国文化的特色。全称“公教大学附属辅仁社”，又叫“国学专修科”，<sup>⑦</sup>英敛之任辅仁社社长。1925年8月15日，英敛之手订《北京公教大学附

<sup>①</sup> 英敛之、奥图尔：《美国圣本笃会创设北京公教大学宣言》，纳爵：《辅仁大事记（续）》，《辅仁生活》，第四期，1940年2月25日。

<sup>②</sup> 《校史述略》，《辅仁大学1937年刊》；《辅仁生活》，第四期，1940年2月25日。

<sup>③</sup> 纳爵：《辅仁大事记（续）》，《辅仁生活》，第四期。

<sup>④</sup> 纳爵：《辅仁大事记（续）》，《辅仁生活》，第四期。

<sup>⑤</sup> 租金来源于奥图尔博士的美国挚友、文豪马慕努（Theodore McManus）和美国密尔瓦基（Milwaukee）天主教妇女会各捐助的10万美金，共计20万美金。纳爵：《辅仁大事记（续）》，《辅仁生活》，第五期，1940年3月25日；董鼎总编辑：《学府纪闻——私立辅仁大学》，台北，南京出版有限公司，1982年版，第3页。

<sup>⑥</sup> 马先生后来又认为学校命名为“公教大学”或“辅仁社”均不恰当，因为学校既然不只是招收公教内青年，然“公教二字，应指所授之科，似非兼招教外生之道也”，而辅仁社也不妥，因为“辅仁社当如师范之类”，他坚持认为应该用“本笃大学”为校名，马相伯：《致英千里先生书》，方豪编：《马相伯（良）先生文集·续编·新编》，第76页。

<sup>⑦</sup> “辅仁”者，取自孔子《论语·颜渊》中的“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英敛之的意图非常明确，就是要保存国学、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纳爵：《辅仁大事记（续）》，《辅仁生活》，第五

属辅仁社简章》，“以辅翼道德、开拓识见，及接人应世必需之常识为目的”。学习两年期满后发给证书，凡“天资明敏，品行端方，愿为深造者，可升入大学预科或本科，并优待免费”。<sup>①</sup>10月1日，正式开学，招学生23人。讲授中国文学、历史、哲学、英文、法文、数学等课程，并遵照教育部章程，学校不设宗教课。<sup>②</sup>

1926年1月10日，英敛之先生因肝癌逝世。3月2日，罗马教廷追封他为“圣大揆国骑尉”荣爵，<sup>③</sup>以嘉奖他楷模般的生活和为创办中国天主教高等教育事业而鞠躬尽瘁的精神。英氏临终时，将校务托付给忘年之交陈垣。1月28日，陈垣正式接任辅仁社社长，9月1日，学校监督司泰来遵照英敛之的遗愿，聘请陈垣出任公教大学副校长，<sup>④</sup>继续筹办大学事务。至1927年春，学校已初步具备了创办大学的条件，乃拟定于当年秋季正式开办大学，分别设置三年制预科和四年制本科。

按照当时教育部颁布的《私立学校条例》的规定，私立学校实行董事会管理，并设正、副校长。据此，学校制定《董事会章程》，以董事会为学校“最高机关”。由奥图尔、陈垣、刚恒毅、马相伯等15名董事组成首届董事会，教宗首任驻华代表刚恒毅被推为首任董事长。1927年6月，举行的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上决定设立总务长、教务长、训育部、会计部、秘书等职，并建立财政委员会、行政委员会、学务委员会，分理各项事务。<sup>⑤</sup>同时决定，自当月起，校名由公教大学正式更为辅仁大学。<sup>⑥</sup>在学校各项建制基本完成以后，当年6月16日，学校向北洋政府教育部呈请立案，再经教育部多次派员来校视察后，11月3日，教育部批准试办大学。<sup>⑦</sup>

9月26日，辅仁大学举行首届开学典礼，有学生（预科、本科生）155人，其中本科生34人。截至1928年9月17日第二学年开学时，大学有本科4个系（中国文学系、英国文学系、历史系、哲学系），7个班，预科3个系（无哲学），3个班，注册本科、预科学生共计195人。<sup>⑧</sup>至此，经过长时期的酝酿、几年的精心筹备，辅仁大学正式建立起来，并初具规模。

随着20世纪20年代以来全国规模的“非基督教运动”和“收回教育权运动”的兴起，中国各教会大学在1927年前后开始适应公教“中国化运动”和基督教“本色化运动”的趋势，并遵照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的《私立大学及专门学校立案条例》等法规，把中国人推上第一线，作学校董事长和校长。<sup>⑨</sup>辅仁大学也不例外。1929年7月，学校遵章改组董事会，聘请“学邃望重、热心公教，且与本校有历史关系”的社会人士

期，1940年3月25日。

<sup>①</sup> 纳爵：《辅仁大事记（续）》，《辅仁生活》，第五期。

<sup>②</sup> 辅仁大学档案·案卷号：12，《呈教育部请求认可》（现藏北京师范大学档案馆，下同）。

<sup>③</sup> 纳爵：《辅仁大事记（续）》，《辅仁生活》，第八期，1941年6月18日。

<sup>④</sup> 纳爵：《辅仁大事记（续）》，《辅仁生活》，第八期。

<sup>⑤</sup> 辅仁大学档案·案卷号：4，《辅大沿革》。

<sup>⑥</sup> 辅仁大学档案·案卷号：12，《函教育总长请派员视察正式认可》。

<sup>⑦</sup> 辅仁大学档案·案卷号：12，《教育部批第526号》。

<sup>⑧</sup> 纳爵：《辅仁大事记（续）》，《辅仁生活》，第八期，1941年6月18日。

<sup>⑨</sup> 辅仁大学档案·案卷号：12，《教育部布告第16号》。



作为董事——张继、马相伯、刚恒毅、陆征祥、陈垣、奥图尔等 27 人组成新的董事会。张继被推举为董事长，陈垣被聘为校长（直到 1952 年辅仁与北京师大合并为止），原校长奥图尔改任教务长。<sup>①</sup>

接着学校又根据国民政府教育部有关大学立案条例，校长陈垣、教务长刘复等人乃着手扩大辅仁办学规模。改文科为文学院，增设理学院、教育学院，共设 3 个学院，分设 11 个系、2 个专修科。并遵章停办预科，改设附属（男子）高中，增设初中。1931 年 8 月，国民政府教育部批准学校立案，学校全称“私立北平辅仁大学”。接着，教育部又批准辅仁大学附属中学备案。<sup>②</sup>至此，辅仁大学形成了大学部、高中部、初中部的总体结构。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天主教大学遍及世界各地，但是，由罗马教廷直接设立的大学，只有十几所，在亚洲，仅有辅仁大学这 1 所。

综上所述，辅仁大学在中国的成功创建，离不开英敛之、马相伯、雷鸣远、奥图尔、陈垣等人的共同努力。先有英敛之、马相伯吁请于下，后有雷鸣远、奥图尔奔走于上，再经英敛之、奥图尔、陈垣等人的积极筹办，才得以兴建。英敛之居功至伟，他既是最重要的发起人，也是奠基人——为学校奠定了办学的宗旨和理念。

英敛之、马相伯等人发起创建天主教辅仁大学的意图是明显针对当时外国天主教势力的蒙昧主义、殖民主义和法国保教权，具有“教育救国”的思想特点，闪耀着爱国、爱教的可贵精神。这一办学精神后来被校长陈垣一直坚持。

英敛之将学校命名为“辅仁”，就是为学校厘定了既要吸收西方最新科学、又能发扬中华固有的优秀文化的办学宗旨。学习西方科学已成为当时学界的共识和社会潮流，但一些青年学子渐渐滋生了一种不重视甚至厌弃中国文化的不良倾向，英敛之为此鳃鳃然，以“国学”沦丧为忧，<sup>③</sup>因而特别强调国学教育。校长陈垣则一直坚持了英氏手定的这一办学思想，并使辅仁大学成为现代中国大学中的国学教育和研究的重镇。

辅仁大学尽管是一所天主教大学，但奠基者英敛之和校长陈垣一直奉行信教自由的办学思想，学校招收教内外学生，不问学生宗教信仰，或是否为天主教徒——陈垣本人就不是天主教徒，在校期间也不强迫学生信教。

（责任编辑 辛岩）

<sup>①</sup> 辅仁大学档案·案卷号：5，《美国本笃会院长司泰来聘马相伯、张蔚西（继）为董事函》；《私立北平辅仁大学校董会董事名单》（1929年7月）。

<sup>②</sup> 辅仁大学档案·案卷号：12，北平市教育局转发《教育部训令第 1409 号》；辅仁大学档案·案卷号：12，北平市教育局转发《教育部训令第 3162 号》。

<sup>③</sup> 纳爵：《辅仁大事记（续）》，《辅仁生活》，第三期，1940年1月25日。

# 试论北京辅仁大学的创建

作者：[孙邦华](#)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刊名：[世界宗教研究](#) PKU CSSCI  
 英文刊名：[STUDIES IN WORLD RELIGIONS](#)  
 年，卷(期)：2004, ""(4)  
 被引用次数：4次

## 相似文献(5条)

### 1. 期刊论文 [张多默](#) [马相伯与徐汇中学、复旦大学](#) -[世界宗教文化](#)2004, ""(1)

马相伯是我国近代著名教育家、中国天主教爱国爱教的典范。他是上海震旦大学、复旦大学、北京辅仁大学的创建人。

### 2. 学位论文 [张越](#) [论陈垣的高等教育管理思想](#) 2006

陈垣，中国现代著名史学家、教育家。陈垣自1927年起担任天主教辅仁大学的校长。1952年院系调整和院校合并后，辅仁大学的部分并入北京师范大学。陈垣又继续担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直至1971年去世为止。

本文的研究内容主要集中于陈垣担任辅仁大学校长期间所从事的高等教育实践活动，并试图从中归纳、整理和提炼出陈垣的高等教育管理思想。这不仅是因为辅仁大学作为天主教会在华兴办的一所著名教会大学，其规模不大，在大陆的办学时间不长(1927-1952年)，但同其他教会大学一起，在办学体制、机构、计划课程、方法、教学实践等诸多方面，更为直接地引进了西方近代高等教育的模式，从而在教育界乃至整个社会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在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还因为陈垣并非是一名天主教徒而执掌辅仁大学，其学识、品格、先进的开放的教育管理理念在其中起到关键作用。

本文的研究内容主要集中于陈垣作为辅仁大学校长期间的教育管理实践活动，而辅仁大学作为一所知名教会大学这一特殊背景，使笔者首先要对中国教会大学的产生、发展和消亡的历程有一个全面而深入的了解。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人民政府接管教会大学以及1952年院系调整、院校合并后，中国大陆的教会大学作为一个历史名词，已经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记忆。长久以来，教会大学作为西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对中国人民进行精神毒害的桥头堡和主要阵地，受到学者乃至社会各界人士的口诛笔伐。的确，教会大学由西方传教士创办，教育经费来自外国差会、国外人士的捐款和中国政府的教案赔款，以在华传播基督教福音为主要目的，在国外注册，颁发外国而非中国政府承认的文凭和学位证书，日常教学和管理活动为外国人把持，中国教职员工地位低下，是不折不扣的“文化租界”。

改革开放以来，研究教会大学的学者，对于教会大学在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历程中所起到的作用和历史地位的看法和观点有了很大转变。立场和态度更加公允、客观。在承认教会大学对中国主权的侵犯和进行文化渗透的同时，人们也注意到，教会大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也是一个积极改变自身、力图适应环境的过程。

教会大学产生于19世纪末，起初设立的目的就是为了培养教会所需的本土化中高级人才，并吸引中国社会的上层人士入学以传播基督教。教会大学发展的鼎盛时期在20世纪初至30年代。其中历经非基督教化、收回教育权、抗日战争等重大历史事件。其间，教会大学改由向中国政府注册，其教育目的虽然力图坚持传播基督教义，但在历史潮流的推动下，已经逐渐转向为中国社会服务，培养中国社会发展所需要的人才。教会大学为中国教育事业带来了先进的教育思想与实践。究其能够在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历程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根本原因，在于它部分满足了中国人在那个救亡图存的特殊年代里渴望获取西方先进知识，以期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愿望。

20世纪初期，中国的天主教精神领袖英敛之、马相伯有感于来自英、美、德等国的新教传教士在中国办起一所所高等学府，中国政府自办的京师大学堂、北洋大学堂也陆续开办起来，而天主教高等教育在中国，却因传教士办学方针和法国保教权的干扰而迟迟得不到应有的发展。辅仁大学就是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中建立的。其两位首倡者，天主教徒马相伯和英敛之先生，有一腔爱国热忱与报国之心，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教宗首肯在华设立天主教辅仁大学。陈垣参与创建了辅仁大学，并于1927年接替了病故的英敛之担任校长的职务。其时，国民革命战争如火如荼，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空前高涨。时代的影响和首倡者的风格使辅仁大学自创建之日起就带有与其他教会大学明显不同的特色。辅仁大学在设立时向中国政府注册；虽然学校的日常管理事务大权仍操于天主教士担任的教务长之手，但陈垣以其深厚的学术功底、高尚的人格与情操、开放的办学理念、先进的教育管理思想，深深地影响着学校的发展。

陈垣，作为一名史学家，学术硕果累累，著作等身，享誉海内外；作为一名教育家，能够不拘一格延揽人才，既重视教学，又重视科研活动，使辅仁大学不仅成为国学研究之重镇，又是传播现代科学技术的先锋。在陈垣的培养与感召下，辅仁大学的教师与学生中涌现出一大批著名的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社会活动家和政治家。

建国后，在担任新北京师范大学校长期间，陈垣又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新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中来。他拥护党的领导，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改造和发展自己的学术研究，为北京师大的发展做出了宝贵的贡献。

研究陈垣的高等教育管理思想，不仅是对历史的回顾，而且对发展现代的高等教育事业有着重要的、积极的意义。陈垣的爱国主义教育观和学术观、开放的人才选拔和培养观念、循循善诱、诲人不倦的育人品德，是他教育管理思想中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

### 3. 期刊论文 [刘松林](#) 1950：“辅仁大学事件”始末 -[党史文汇](#)2005, ""(8)

1 辅仁大学是由天主教会设立的。1911年，中国天主教界知名人士、江苏丹徒人马相伯和北平人英敛之鉴于天主教在中国仅有两所大学，上书罗马教廷，请才高德硕之士，来中国增设公教大学，发扬中国文化，介绍世界知识。后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计划未能实现。

### 4. 期刊论文 [刘松林](#) [Liu Songlin](#) [一九五〇年辅仁大学事件始末](#) -[党史纵横](#)2003, ""(6)

辅仁大学是由天主教会设立的。1911年，中国天主教界知名人士江苏丹徒人马相伯和北平人英敛之，鉴于天主教在中国仅有两所大学，上书罗马教廷，请才高德硕之士，来中国增设公教大学，发扬中国文化，介绍世界知识。后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计划未能实现。1919年，罗马教廷派遣代表来华，考察教会教育情形，在考察报告中，提出中国的高等公教教育机关不足。庇约十一世(Pius XI)当选教宗后，下谕“本笃会”立即进行，并亲自捐款十万美元金作为学校基金，带头倡导这个活动。1923年8月7日，全美“本笃会”遵照教宗的下谕召开会议，决定委托宾西法尼亚州圣文森学院院长司泰(Stehle)全权办理此事，随即司泰委任在华筹备天主教大学甚为积极的奥图尔(G. B. O. Toole)为校长。1925年1月，奥图尔来到中国，在旧涛贝勒府先开办学预科一班，取名为辅仁社，并聘请英敛之为社长。后英敛之因劳累过度，于1926年1月逝世，教务开始由陈垣先生主持。

### 5. 学位论文 [王建平](#) [马相伯教育思想研究](#) 2007

马相伯先生(1840-1939)是近现代中国著名的爱国主义思想家和教育家，他于1903年创建了现代中国第一所私立高等学府——震旦学院，1905年创办了复旦公学(1911年改称复旦学院，1917年改为复旦大学)，先后担任了这两所院校的监院和校长。1912年10月他代理北京大学校长，1926年参与创办辅仁大学，他还曾参照法国科学院的形式，积极策划筹建国家最高学术研究机构——函夏考文苑。马相伯在长期创办高等学府和从事高等教育的实践中，对大学的内涵、使命、学术思想等作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并逐渐形成自己对高等教育的独特认识。

本文试图从马相伯的教育救国思想和实践，探讨他的教育思想特色，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对当代教育的启示。

本文共分为四部分：

第一部分：考察马相伯的教育实践。

第二部分：叙述马相伯教育思想的内容。文章主要从四个方面进行了概括：(一)教育独立，学术自由；(二)中西会通，文理并重；(三)讲求教育，全面发展；(四)学生自治，民主办学。

第三部分：阐释马相伯教育实践和思想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第四部分：马相伯教育思想对当代教育的启示。

### 引证文献(3条)

1. 薛玉琴 [“真宗教家必爱国”——论抗战时期的马相伯](#)[期刊论文]-[抗日战争研究](#) 2009(3)
2. 薛玉琴 [马相伯研究七十年](#)[期刊论文]-[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6)
3. 孙邦华 [“入乡随俗”：明清耶稣会士的文化适应政策及其现代意义](#)[期刊论文]-[东南学术](#) 2006(6)

本文链接：[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sjzjyj200404013.aspx](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sjzjyj200404013.aspx)

授权使用：广东商学院图书馆(gdsxy)，授权号：33638a4b-87e2-445c-99f6-9e4d007ea63b

下载时间：2010年12月15日